**从山水深处走来的精神传承**

皖南的青山绿水间，藏着太多被时光浸润的故事。那些白墙黛瓦的古村落里，不仅有徽派建筑的精巧，更有一代代人用生命书写的家族文化。张家，便是这其中不容忽视的一脉。从近代治史大家张一怡到音乐家张曙，再到无数默默无闻却坚守家训的族人，他们的生命轨迹如同一串珍珠，被一条名为“家风家训”的丝线悄然串联。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，触摸那些散落在书信、日记、口碑中的家训碎片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图谱，更是一个民族在岁月流转中不曾褪色的文化基因。

**一、“守拙”与“求新”**

皖南多山，山路崎岖却藏着天地的理趣。张家家训里，最动人的莫过于对“拙”与“新”的辩证坚守，恰如这山与水的相依——山有其厚重，水有其灵动，二者共生，方得生机。

张一怡先生的治史生涯，是对“守拙”二字最生动的诠释。这位生于清末的学者，一生历经战乱动荡，却始终将“板凳甘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奉为圭臬。在他留存的手稿中，我们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，小到一个年号的考订，大到一段史实的辨析，无不透着近乎执拗的认真。曾有晚辈问他：“世事如此纷乱，何必在故纸堆里耗费心力？”他在回信中写道：“祖宗留下的文脉，如山间清泉，看似柔弱，实则能穿石。我辈能做的，便是守住这泉眼，莫让它被泥沙淤塞。”这朴素的话语里，藏着家训对“拙”的深刻理解——所谓拙，并非愚笨，而是一种不投机、不浮躁的定力，是认准方向便矢志不渝的坚守。在那个“全盘西化”呼声渐高的年代，张一怡既不盲目排外，也不随波逐流，而是沉下心来梳理中国史学的脉络，他认为“新学问当有旧根基，如建楼需先固其基”，这种对传统的敬畏与坚守，正是家训中“守拙”精神的延续。

而音乐家张曙的人生，则演绎了家训中“求新”的另一面。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，张曙的创作始终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探索。他自幼受皖南民间音乐的熏陶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却并未止步于此。在上海学习期间，他系统研习西方乐理，将五线谱与工尺谱对照，试图为中国音乐寻找新的表达。他创作的《洪波曲》，以传统戏曲的板腔体为骨架，融入西方交响乐的激昂节奏，在抗日战争中唤醒了无数国人的斗志。有人曾质疑他离经叛道，他却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祖宗的智慧在骨子里，不在皮毛上。若只守着老调子不变，再好的曲子也会被时代听厌。”这种对创新的追求，并非对传统的背离，而是家训中“不拘陈法，应时而变”的生动实践——所谓新，不是无根的标新立异，而是在理解传统精髓后的创造性转化。

细究张家的家训文本（多散见于族中长辈的书信与训诫），“守拙”与“求新”从未被割裂。如族中流传的《治家格言》所言：“学贵有恒，如磨石取刃，久方得锋；思贵有创，如开窗纳光，新则得明。”这智慧恰如皖南的竹——扎根于岩缝，是守拙的坚韧；节节向上，是求新的生长。张一怡与张曙，虽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，却在平衡中共同诠释了家训最本真的生命力。

**二、“修身”与“济世”**

皖南的古村落多有祠堂，祠堂中立着“耕读传家”的匾额，而匾额背后，往往藏着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抱负。张家家训最深刻的底色，便是这种将个人修养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的“家国同构” 意识 —— 家训从不局限于“小家”的柴米油盐，而是将“修身”作为“济世”的起点，让每个族人都明白：家族的荣光，永远与国家的兴衰同频共振。

张一怡在战乱中守护古籍的故事，至今仍在族中流传。1937 年，日军逼近皖南，他所在的书院面临焚毁的危机。当时已年过六旬的张一怡，拒绝了晚辈“先保自身”的劝说，带着弟子们将数万卷古籍分装成箱，雇了十几艘竹筏，沿着新安江逆流而上，往深山中转移。途中遭遇山洪，几箱珍贵的宋刻本险些坠入江中，他不顾年迈，亲自跳入冰冷的水中抢救，事后高烧不退，却仍念叨着“书在，文脉就在”。他曾对家人说：“我守的不是张家的书，是天下人的文脉。国家若失了文脉，便如人失了魂魄。”这种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命运相系的担当，正是家训中“修身以济天下”的核心要义。在张家的训诫中，“孝”不仅是对父母的供养，更是对家族责任的承担；“忠”不仅是对朝廷的服从，更是对民族大义的坚守。这种超越狭隘家族观念的格局，让家训有了更广阔的精神维度。

张曙的音乐创作，则将这种家国情怀融入了艺术的血脉。他的作品中，很少有风花雪月的闲情，更多的是对民族命运的呐喊。1938 年，他在武汉创作《壮丁上前线》，用朴实的民谣旋律配上激昂的歌词，让无数青年热血沸腾。有人问他：“音乐为何要如此沉重？”他回答：“国难当头，琴弦也该带着锋芒。若只唱靡靡之音，便是对不起脚下的土地。”他的人生选择，也印证了家训的指引——在上海时，他拒绝了日伪政权的利诱，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，哪怕生活清贫，也始终坚守气节。1940 年，他在桂林遭遇日军轰炸，不幸遇难，临终前仍紧握着未完成的乐谱。这种“以乐为刃，以声报国”的选择，与张一怡守护文脉的执着，虽形式不同，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：将个人的价值实现，融入国家与民族的需要之中。

翻开张家的族谱，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。有在灾年开仓放粮的族人，有在乱世教书育人的长辈，他们或许没有张一怡、张曙那样的声名，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“修身济世”的家训。家训中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的告诫，“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”的训示，早已不是挂在祠堂墙上的教条，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。这种将“小家”与“大家”相连的智慧，让张家在百年变迁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精神自觉——家族的延续，从来不是血脉的简单传递，而是精神的代际传承；个人的幸福，永远与国家的安宁密不可分。

**三、“朴言”与“实行”**

皖南的老人们常说：“好家训不在纸厚，在人心。”张家的家训，从不是鸿篇巨制的典籍，多是些散落在长辈的唠叨、书信的叮嘱、行为的示范中的朴素箴言。这些看似平淡的话语，之所以能穿越时空，在于它们从未被束之高阁，而是被一代代族人用行动不断诠释、丰富、传承。

张一怡的书房里，挂着一幅他亲手书写的对联：“待人以诚，如春风化雨；处事以恒，似滴水穿石。”这对联背后，是他一生的行事准则。据族中老人回忆，他对学生从不疾言厉色，即便发现错误，也总是耐心讲解，曾有家境贫寒的弟子买不起书，他便将自己的藏书慷慨相赠，甚至资助其生活费。这种“以诚待人”的宽厚，并非刻意为之，而是自然流露的修养。而他对史学研究的“恒”，更不是一句空话——一部《皖南史考》，他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年，期间数次因战乱中断，却始终没有放弃，直到晚年双目渐昏，仍让弟子读给他听，逐字修改。这种将家训融入日常的坚持，让“诚”与“恒”有了可感的温度。

张曙的人生中，同样可见家训“实行”的印记。他自幼受母亲影响，母亲常对他说：“学艺先学德，德不正，艺再高也站不住脚。”在上海求学时，他曾有机会加入一个名利双收的乐队，却因对方要求演奏低俗乐曲而毅然拒绝。成名后，他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，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和资助青年音乐人。他常对家人说：“祖宗教我们‘节俭’，不是小气，是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。”这种对“德艺双馨”的践行，让家训中的道德规范有了具体的落脚点。

更动人的是那些普通族人的故事。张家族人中，有不少是乡村教师，他们秉承“读书以明志，育人以报国”的家训，在偏远山区坚守数十年；有从事手工艺的匠人，遵循“手艺即良心，精工不欺人”的教诲，将徽派技艺代代相传。他们或许说不出高深的道理，却用日复一日的行动，让家训变得可触可感。正如一位老人所说：“家训不是背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长辈怎么做，我们就学着怎么做，这就叫传承。”

这种“朴言实行”的特质，让张家家训避免了成为空洞说教的命运。它不像有些家族的家训那样追求辞藻华丽、体系完备，却像山间的石阶，朴实无华，却能引导人一步步走向高处。它告诉我们：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传承，不在于形式的完美，而在于能否融入生活，成为人们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。

**四、家训的当代回响**

站在今天回望皖南张家的家训，我们或许会发现，那些诞生于农耕时代的道德规范，在现代社会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当我们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，被功利主义的思潮影响，张家家训中“守拙”的定力、“求新”的勇气、“济世”的情怀、“实行”的踏实，恰是我们亟需补足的精神养分。

在学术研究日益追求“短平快”的当下，张一怡“十年磨一剑”的治学态度，提醒我们慢下来的价值。真正的学问，从来不是跟风赶潮的产物，而是沉下心来深耕细作的成果。在文化创新面临“无根化”风险的今天，张曙 “扎根传统、面向时代”的创作理念，启示我们：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否定，而是在理解传统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，只有扎得深，才能长得高。

在个人主义渐盛的社会中，张家“家国同构”的家训，更显珍贵。它让我们明白：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只有将“小我”融入“大我”，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、民族复兴相结合，生命才能获得更深远的意义。而那些普通族人“朴言实行”的坚守，则告诉我们：传承文化不必惊天动地，从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开始，从坚守基本的道德准则做起，便是对传统最好的继承。

皖南的山水依旧，张家的故事还在继续。那些流淌在血脉中的家训，早已超越了家族的范畴，成为一份可供更多人汲取力量的精神遗产。它像一盏灯，从历史的深处照来，不仅照亮了一个家族的前行之路，也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份关于如何生活、如何做事、如何做人的珍贵指引。

家训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，而是流动的活水，在代际传承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，却始终保持着最本真的精神底色。正如皖南的山永远青翠，水永远灵动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精神传承，也会在时光的淘洗中，愈发清晰，愈发有力量。而我们，能做的便是接过这盏灯，让它在新的时代里，继续照亮前行的路。